



# 从“圣·迭戈”号沉船考古看海上的社会生活



彭维斌



林 蓁

(福建省厦门市博物馆)

**摘 要:**对古代航海船只上社会群体生活状况的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人类航海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内涵构成。但由于资料的缺乏,海上社会生活研究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近些年来,由于考古工作者对沉船的科学发掘及对生活遗迹与遗物的详细纪录,使得古代海上社会生活的研究获得越来越丰富的资料。本文以“圣·迭哥”号沉船考古发现为基础,并结合文献资料、航海日记以及其他古代沉船的相关信息,对古代海上社会群体的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进行了复原与探讨,以期能为海上社会生活史的深入研究做基础性的工作。

**关键词:**“圣·迭哥”号;沉船考古;海上社会生活

**Abstract:** The study of social life on board is an important topic and constitute of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and human voyage history. But the shortage of information concerned has limited the study. In recent years, many ships wrecked in ancient times has been found and unearthed scientifically from sea, which has provided rich information about social life on board. On the base of maritime archeology of San Diego (AD1600), with the analysis of voyage documents and maritime archeology of many other wrecked ships, the article tries to rebuild the social life on the sea and put forward the deep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and human voyage history.

**Key words:** San Diego maritime archeology social life on board

人类自创造出舟船,并能在大海甚至大洋中远航开始,就产生了与陆地生活迥异的海上社会生活。伴随着海洋文明的拓展,海上社会群体的成长,海上社会生活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大。然而,大多数研究社会史的著作,往往都会忽视对航海船只上社会群体的生活研究,这大概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缘故。同样,由于种种原因,船上的人们也不注意记录他们的口传文化习俗,更没有搜集船上社会生活的资料,导致相当多有关他们生活的实物证据流失。正如瑞典人类学家 Henning Henningsen 博士所说:“没有几个航海博物馆能把船上的生活情景展示出来,这的确让人失望。”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水下探测技术设备的完善,以及水下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有关

沉船上人们生活用具的遗物的发现引起社会学家的兴趣。尽管这些遗物的记载寥寥数笔,并且大多没有提供具体的发掘位置和相关信息,而且人们的目的是通过生活舱内留下的生活迹象,确定船主身份和沉船的来历,进而为研究航线、贸易港口等海洋经济史、交通史等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但它们仍是广泛与深入了解海上社会生活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世纪初的一艘西班牙沉船“圣·迭戈”号得到了水下考古专业人员的科学发掘,他们对“圣·迭戈”号沉船上所有出水文物进行详细描述、摄影、绘图,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之后有关专家通过这篇科学的水下考古报告,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船上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复原,为我们研究海上社会群体及其生活方式提供了至关

重要的范本。

“圣·迭戈”号是一艘具备海上战斗能力的西班牙贸易商船，它是欧亚航路初拓史上经东洋航路上的吕宋水道把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商品转运欧洲的中外商船之一<sup>①</sup>。1600年12月14日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南马尼拉湾南口遭到荷兰军舰的炮击，沉没于纳苏格布(Nasugbu)西南的好运礁(Fortune)海面。1991~1994年间，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和“环球第一”探险队对该沉船进行了水下发掘<sup>②</sup>，历次调查发掘出水文物达34407件，除陶瓷器、中国、泰国、菲律宾等地生产的陶器大宗货物外，还发现了2400余件金属制品，包括大型铁锚、铁炮、炮弹、殖民墨西哥的菲力普一世时期银币、金项链、金簪、金饰品等。

“圣·迭戈”号在十六、十七世纪属大型远洋贸易船只，船上人员数量多达两、三百人，人员构成除了船员之外，还有贸易商人、护船武装人员、牧师、甚至女性，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圣·迭戈”号沉船上具有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已形成较完整的社会体系。在这个社会里，存在着维持人们基本生活与交往的所有关系，如何生存下去是船上所有人——无论身份、地位——首要考虑的问题，其次，就是如何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从而确保这个海上社会群体的稳定。从“圣·迭戈”号沉船上人们生活的遗物与遗迹来看，主要涉及海上社会生活的五个方面的问题。

### 一. 饮食问题

冷冻机器尚未问世的16世纪，航行在海上，船上生活所需的食物只能带鲜活的、脱水的、盐浸过的、腌制的或罐头装的。古代沉船遗址鲜有食用动植物遗骸或以及能保存下来，在“圣·迭戈”号沉船遗址发现的食用动物遗骸就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早期船上饮食生活的难得资料。尽管全面详尽的研究尚未完成，在对这些动物群遗骸的初步分析后发现，这些动物遗骸多为猪、牛、鸡等的骨头。船上的人们通常在靠近主舱口下层的甲板上用砖砌或土块砌成的炉子上烹煮食物。1978年上海市嘉定县封浜杨湾发掘的一艘宋代古船的船舱内发现的砖瓦遗存就是船上人们用来烹饪食物的炉子的原材料<sup>③</sup>。1973年，泉州后渚港宋元沉船上也发现有铜钵、铜勺、木锅盖等炊具<sup>④</sup>。在航行途中，还会捕捞或钓一些海鱼补充食物。1998年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在潘达南岛(Pandanán Isl.)与巴拉望岛之间的狭长水道打捞的中国木帆船就发现航行中钓鱼用的鱼钩<sup>⑤</sup>。

船上的人们主要喝啤酒、白酒或别的烈酒。这些

酒装在罐或瓮里，然后用编织网兜兜起来挂在船舱顶上。在“圣·迭戈”号上发现的一件有刻度的金属杆据推测可能是测量酒容量用的器具，因为，按照船上的惯例，供应男性的酒实行定量配给制。由于航行几个星期后水会变得很难喝，水主要用来烹饪和进行卫生清洁。

“圣·迭戈”号船属大型海船，船上的饮食分三个等级：为高级官员和上等乘客准备的食物用精致的银器盛装，由仆人端到卧舱服侍他们；中级官员和中等客人的食物用瓷器盛装放在廊道的桌上；低层的人一般独自或一小群聚在一起，用粗陋的陶碗吃饭。

船返航时，新鲜水果、蔬菜、调味品以及新补充的酒、食物、腌肉和活的禽畜类用箱子装好堆在甲板上。

### 二. 保健和卫生问题

早期远洋航船上载人数相当多，通常还有成群的老鼠和各种寄生虫，船上的卫生设施相当简陋，又不能经常洗澡，因此大部分男人只好用海绵擦身体，衣物几乎不洗，船员和买甲板票的乘客根本不洗澡，如若真需要洗，也只是用海水简单冲洗。

船上的气味强烈地刺激着那些敏感的乘客。许多讲究的乘客用链子把金属香水瓶挂在脖子上，这样，香水的芳香油成分可以掩盖身体的臭味，“圣·迭戈”号沉船发现的66件贵金属小盒(可挂在项链下端)就起着香水瓶的作用。

这个时期的医药以及医疗设备也很简陋。在需要用药时，才用铜研钵和碾槌把纯天然药材弄成粉，配成药。由于缺乏锻炼和新鲜食物，便秘是常发病症。早期船员食物中缺乏抗坏血酸的维C，导致他们容易患败血病。然而，当时的中国船员却很少罹患此病，原因在于中国航船通常尽量近岸航行，补充新鲜饮水及蔬果相当容易，加上其航程通常不长，船员又有携带蜜饯的习惯，因而不乏维生素的补给。而欧洲远道而来的海员没有这些便利条件，他们往往在出海大约半年之后，开始出现败血症的症状，死亡率很高。一直要到18世纪，英国人才发现吃柠檬可以预防败血症<sup>⑥</sup>，并且，欧洲的贸易船上开始配备随船医生。1985年在印尼宾坦岛(Bintan)外约12海里的斯特霖威夫司令礁(Admiral Stellingwerf Reef)附近的吉德亚多夹暗礁(Reef of Geldria's Droogte)发现的1752年沉没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吉特摩森(Geldermosen)”号商船上一个药瓶上有“F.B”标记，这正是东印度公司档案所记“吉特摩森”号商船随船医生Frederik Berkenhonor名字的缩写<sup>⑦</sup>。

“圣·迭戈”号船上面临的健康和卫生问题是早期海船生活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17世纪早期一个西班牙大帆船上旅行者的日记中这样写到:“看到这么多成群的老鼠吓坏了所有的人,因为在船上它们的数量实在太大了”。

### 三. 娱乐生活

远洋长途航行,无聊是船上人们通常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为了打发漫漫长日,船上会组织一些娱乐活动。若甲板上没有堆满土特产和商品货物,通常会在上面举行音乐会或舞会,只有暴风雨来临或遭到海盜袭击时,人们才会放弃庆祝活动。从打捞出的混杂物品中发现的一个棋子可以得知,“圣·迭戈”号船上的人们还玩牌、听音乐和下棋。同样,在泉州后渚港海滩上发现的一艘宋元沉船上发现的象棋、楷书“且了浮生一载”的印刷品残件<sup>⑧</sup>。越南南部昆仑岛海域发现的清代帆船的木琴、耳勺、象牙和骨骼制成的骰子、石砚、墨石等<sup>⑨</sup>。这些娱乐休闲以及文化用具体现出船上人们生活丰富多彩的一面。

### 四. 宗教仪式

在“圣·迭戈”号沉船上发现了水手在宗教活动中做弥撒用的一串金色的象牙念珠和一个青铜钟。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在船上仍举行严格的宗教仪式。当时的大多数船上都有牧师,他们在行使日常职责外,还要定期做弥撒。“圣·迭戈”号船上有三个牧师:天主教耶稣会的 Fr.Diego de Santiago,阿古斯汀阶层社团的 Fr.Francisco de Valdes 和修道院做杂役的 Bartolome Calvo,他们是应“圣·迭戈”号船长 Dr. Antonio de Morga 的私人要求来到这艘旗舰上的。

在船起航前,牧师要听船上大多数人和士兵的忏悔。牧师往往会乘此机会鼓励他们为上帝和西班牙国王陛下勇敢地作战。

神甫 Diego de Santiago 是“圣·迭戈”号沉船遇难的 259(109 个西班牙人,150 个印度人)个人中的一员。神甫 Pedri Chirino,SJ 后来在谈到他的英雄事迹时说:“他死的重如泰山,因为他鼓舞了所有向他作过忏悔的人。在船开始沉没时,神甫本来准备跳到海里,但一个军官对他说:‘神甫,您若能听我说一个字,我的灵魂就得到了拯救’时,他留在了船上。他怀着极大的慈悲之心,听那个军官的忏悔,直到最后一刻,他和忏悔者一起被大海吞没。”

在航船上进行宗教仪式,祈求神灵保佑是古今中外船上社会群体在共同的求生存心理作用下所采

取的行为。大海凶险,海难频发,面对茫茫大海,人类常常感到惊恐与无助,在长期的海上生活中,欧洲的远洋航船大都会随船配备牧师,并定期做弥撒等宗教活动,而东方的航船则创造出海上保护神,并在船上供奉这些保护神的偶像,例如妈祖就是环太平洋地区各类航船都会供奉的重要海上保护神灵。

除了必要的宗教仪式之外,船上还应存在着为保证航行安全而约定俗成的各种禁忌文化,这些禁忌文化规定着船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事项与遵守的规则,但是,此类禁忌文化若没有化为文字,是很难在物质上得到体现与发现的。因此,有待于沉船考古与现代海上船只的人类学调查研究相结合,共同发掘海上生活的禁忌文化。

### 五. 社会构成

在早期的航海船上,人员已经开始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进行划分。船上只有一人拥有最终的权力和责任,船上社会阶层也只有发出指令和服从指令的两个等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船上成员都是男性,因此严格的等级和男性社群的这些特征使船上的社会成为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圣·迭哥”号沉船遗址中还发现了属于女性的遗骨和女性饰物,由于相关资料,包括航海日志都没有提到这些女性的身份、国籍以及姓名。尽管“圣·迭哥”号沉船具有与传统的纯男性社群不同的海上社会构成,但我们仍无法了解女性在船上生活的细节,这有待于有更多的沉船资料的发现与研究。

从“圣·迭戈”号沉船上社会生活的初步研究,可以看出船上的生活方式与陆地上的生活方式的共同点是,都把吃住和卫生保健等物质需求当作第一需求,把娱乐和宗教信仰等精神需求放在其次,而且船上也实行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以及各种因素的制约,船上人们生活的具体细节则与陆地上的生活有着极大的不同,尤其在 16—18 世纪海洋文明拓展时期,当时的远洋船只即是商船,又是战船,暴风雨和海盜以及敌舰都是威胁船上人们生命安全的重要因素,而且船上的各种条件也相当原始与简陋,疾病和瘟疫也对人们的生存造成威胁,因此,如何在海上生存下去,成为船上社会群体考虑的首要问题。由于“圣·迭戈”号沉船发掘的实物资料非常有限,尚不能为全面具体地复原船上的社会生活提供足够的信息,并且“圣·迭戈”号沉船所反映的海上社会生活只是十六、十七世纪欧洲远洋

航船的生活片段,对于人类整个航海发展史上海上社会生活的复原与再现是远远不够的。

再者,自20世纪中叶以来,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开展的沉船考古工作不断得到深化与细化,在这些海域开展的一系列水下考古、潜水探险活动,打捞的许多古代沉船都有反映海上社会生活的生活用具的发现,这些生活用具既有时代的特征,又有文化区别,他们基本反映了人类整个航海史发展的时空坐标上的海上生活的不同特征与文化本质。例如山东省蓬莱县登州港发现的元代战船发现的除铁炮、铁剑等武器之外的龙泉青瓷碗、高足杯、草席、滑轮等器具与用具<sup>⑩</sup>;1697年沉没在非洲东海岸肯尼亚蒙巴萨(Mombasa)的葡萄牙战舰“圣安东尼奥·唐纳(Santo Antonio de Tanna)”号上打捞的中国青花瓷盘、牙梳、木桶、木锤、木质家具构件等用具<sup>⑪</sup>,就是复原和研究中西古代舰上军事生活的重要资料;在泰国西昌岛(Ko Sichang)海域发现的沉船上有中国式铜锁的锁头和钥匙、青铜碗、国际象棋子、欧式步枪枪托等属于船员的用具和武器<sup>⑫</sup>,则反映了中西海

洋文明相互影响与融合下,海上社会生活的文化多元化趋势。随着越来越多的有关海上社会生活的沉船考古资料的出现与研究,以及近现代人类学家关于海上社会生活的调查与记录资料的不断发现与研究,与陆地社会生活相对立的海上社会生活将以其特殊的文化内涵成为社会史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结 语

通过对海底沉船的考古研究,结合历史文献及近现代可观察的船上生活的人类学调查等相关资料,复原古代海上的社会生活,进而释读海洋社会经济与人文发展史是一项崭新的学术课题,以往的船史、海交史、海外贸易史等专题研究领域较多停留在对古船及相关船货资料的描述、分类、航线的确定等的研究上,鲜有关注到古代船上的人们是如何生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等问题。现在,这些问题的研究已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因为,这些问题恰恰是海洋文明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表一:1992年至1993年“圣·迭哥”号沉船打捞物品一览表

瓷器	数量(件)	陶器	数量(件)	石制器	数量(件)	金属制品	数量(件)	有机物	数量
未使用过的完整器	423	未使用过的完整器	78	未使用过的完整器	327	器具	32	骨骼	2727
完整器	51	完整器	14	完整器	106	黄金饰品	2	木材	191
完整器	242	完整器	22	完整器	171	扣形物	104	绳索	134
可复原器	164	可复原器	75	可复原器	261	圆形小徽章	6	木炭	10
残破器	548	残破器	473	残破器	2165	硬币	139	椰子	2
破片	2260	破片	758	破片	920	(挂在项链下)		壳	1
碎片	792	碎片	62	碎片	239	保藏纪念品	66	软木	6
无法归类物		无法归类物		无法归类物		的	31	塞	4
						贵重金属小盒	17189	象牙	2
						剑的断片	197	树脂	2
						滑膛枪子弹	5	贝壳	1
						炮弹	14	牙齿	
						铅锭	3	野猪	2
						大炮	3330	的獠牙	1
						头盔		树皮	55
						无法归类物		革	
								念珠	
								种籽	
总共	4480	总共	1482	总共	4189	总共	21118	总共	3138
总计	34407								

表二:1992年至1993年“圣·迭哥”号沉船打捞瓷器类别

瓷器	器类	瓷器	器类
克提克瓷	瓶、罐、壶、盘、碗、杯	汕头器	盘、瓶、罐

表三:1992年至1993年“圣·迭哥”号沉船打捞陶器类别

瓷器	器类
日常实用器	球状锅、凸形盖、带把罐、高颈罐、带足杯、平底杯
特殊用途器	肩部刻划水波纹的橄榄瓶、器身剔刻竖纹的杯、南瓜形器、器身饰缠枝花纹的壶、器身镶嵌青花瓷片的容器、盛水瓶



## 参考资料:

① Chirino,Pedro,S,J,(1969) Relacion de las Islas Filipinas (The Philippines in 1600). Historical Conservation Society XV, Manila.

② Lyon, Eugene, (1980) The Treasure of the Concepcion (An Essay). Copyright John Shedd Aquarium, Chicago.

③ Muckelroy, Keith, (1978) Maritime Archa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注释:

① 吴春明:《近古欧亚航路网络中的沉船考古》,邓聪、吴春明《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② Cynthia Ongpin Valdes, Allison I, Diem, Saga of the San Diego (AD1600), National Museum, Inc Philippines, 1993.

③ 上海博物馆:《嘉定封浜宋船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2期。

④、⑧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海洋出版社,1987年。

⑤ Alya B. Honasan, The padanan junk: the wreck of a fifteenth century junk is found by chance in a pearl farm off pandanan island.

⑥ 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⑦ 吴春明:《怀中国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与船货》,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

⑨ Michael Flecker, Excavation of an oriental vessel of c.1690 off Con Dao, Vietnam. IJNA (1992) 21.

⑩ 袁晓春:《略谈蓬莱元朝沉船及登州港》,《海交史研究》,1990年(2)。

⑪ Robin C.M.Piercy, Mombasa wreck excavation preliminary report, 1977, IJNA (1977).

⑫ Jeremy Green, Rosemary Harper and Intakosi, The Kosichang one shipwreck excavation 1983~1985, A progress report. IJNA (1986) 15.2.

(上接第 053 页)

③③ 四川省博物馆等:《广汉三星堆遗址》,图十四,2,《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③④ a.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第11期; b.冯汉骥:《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80年第12期; c.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彭县西周窑藏》,《考古》1981年第6期。

③⑥ 尹盛平:《西周的弓鱼国与太伯、仲雍奔“荆蛮”》,《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一九八一),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1982年。

③⑦ 魏京武:《陕南巴蜀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③⑧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等:《碱洋青铜器》,第242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③⑨ 冯汉骥:《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80年第12期。

④⑩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彭县西周窑藏》,《考古》1981年第6期。

④⑪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第30页、第5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